

马克思主义与儒学文化融合的“实践”审视

李 远

(中共聊城市委党校, 山东 聊城 252000)

摘 要:作为与实践相联系的马克思主义与儒学这两大文化形态,二者的融合仅凭理性思辨是难以实现的,必须立足于实践,在历史和逻辑的统一中把握其可能性、现实性,唯此才能通过融合形成中国社会发展的精神合力。二者融合的必要性的隐蕴于当代实践发展之中,二者相近、相似的可融合内容只有立足于实践才能把握。马克思主义与儒学融合应坚持历史实践和现实实践贯通、思想传承和创新转化统一、马克思主义为主和儒学为辅的原则。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儒学;传统文化;实践;文化融合

中图分类号:G0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8-7699(2015)04-0087-07

近年,面对国际国内文化的困境,回眸、挖掘传统文化资源以寻求脱困之道,已构成思想界潮流性趋势。于是,在中国历史长河中呼风唤雨的儒学文化引起世人关注。尤其是习近平总书记几次发表关于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讲话以来,作为儒学之源的中国,关于马克思主义与儒学关系问题日益引起理论界重视,且讨论也日渐深入。马克思主义是中国共产党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指导思想,儒学思想在中国近代之前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一直起着主导性作用,与社会实践紧密联系的两大文化形态的融合,绝非是依托理性思辨所能解决的,而应以“实践”视角加以照观才是应有的态度和方向。惟有如此,才能使二者融合交汇于中国社会的实践逻辑,形成推动中国社会发展的巨大的精神合力。

一、对两种观点的“实践”批判

从近年的讨论看,主张马克思主义和儒学思想通过“对话”以促进其发展,已成为理论界的主流倾向。但也夹杂着两种极端性论调:一种论调认为,儒学思想作为中国固有传统,相伴中华民族发展几千年,已经作为民族记忆和文化符号,凝结在中国人的思维和生活方式之中,它不需要和马克思主义结合,它本身即能承担起中国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思想功能。因此,对马克思主义以及传入中国后占据主流意识形态的越俎代庖嗤之以鼻;另一种论调恰恰相反,认为马克思主义经过中国化,以儒学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精髓已经被马克思主义批判性的改造和吸收,相应地也就完成了马克思主义对儒学的替代,现在重提二者融合没有任何意义。综合分析两种观点,可以转化为两个问题:一是倡导儒学是否需要排斥马克思主义?二是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是否不需要儒学思想的参与?思想文化的选择本身关系到中国社会实践未来的发展,两种观点在形式上表现为理论之争,但根子上却是关涉到发展原则选择的实践问题。这就要求我们,应该立足于实践,从理论逻辑和历史逻辑结合的角度,对上述理解作出符合客观实际的分析。

首先,倡导儒学价值,是否需要以排斥马克思主义作为前提?

从儒学的本性看,儒学文化自身具有开放性特点以及文化的融化功能,有与其他文化“和平共处”的特性。即使面对族外文化,儒学也善于包容、吸纳,使其与其他文明发展形成互动、共鸣。大规模的文化融合在中国文化史上发生了多次。第一次发生在被确立为“独尊儒术”的汉代以后,印度佛教传入中国,佛教文化的输入经历了由汉至唐几百年的批判、选择和消化过程,对中国固有文化包括儒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一影响遍及宗教、哲学、文学艺术、伦理、民俗、社会心理各个领域。佛学被摄入了中国文化的生命之中,成为与儒学共存的文化现象。第二次,明清之际西学的传入。当时大批耶稣会传教士来华传教的同时,带来了西方的科学与文化,对当时以儒学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文化造成了猛烈冲击。黄宗羲、徐光启、李之藻、杨廷筠等开明的儒家学者都是当时欢迎与学习西方文化与科学的先驱。西学的冲击与当时思想文化界的启蒙思潮相呼应,对中国儒学文化的发展起了积极的作用。第三次,便是鸦片战争以来西方文化的全面输入。这次文化输入与武力侵略相伴,对于中国来说,起初具有被动性质。西方的入侵,使一向自我感觉良好的“天朝大国”终于意识到自己政治、军事尤其是文化上的脆弱与落后,因此,学习西方先进的思想文化以救国图强成了当时有识之士的普遍追求,相应地必然冲击了儒学的传统地位。这次西学影响持续到 20 世纪初,李大钊、陈独秀、毛泽东等后来成为共产党人的先进分子,从不同角度相继对引进、吸收西方文化作出了自己的选择,其最大成果即是选择了马克思主义。从儒学吸收外来文化的历史过程可以发现:儒学并非是故步自封,而是以开放心态善于吸收文化营养的思想形态,其本性决定了,儒学并不否定马克思主义的存在意义,二者有着共存共荣的可能。

我们之所以在倡导以儒学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文化当代价值的同时,承认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现实存在及其主流地位,还要从历史必然性角度来理解。这不得不从马克思主义进入中国时的历史实践特点谈起。任何一种文化的时空流动,并非是依赖于文化自身,而是有赖于现实实践基础上的人们对文化合理性认知以及承接的自觉程度。马克思主义蕴涵着科学真理,属于世界性的先进思想体系,但它不会自发飘荡到中国并转化为影响中国历史进程的思想“幽灵”,而是立足于中国实践的先进分子根据中国的现实需要自觉地引进、传播,从而使其与中国历史形成了共鸣、律动。当时的中国社会处于什么实践背景呢?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在西方列强坚船利炮的轰击下,陷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处于被动挨打的局面,中华民族在血与火的荡涤中挣扎,中国社会面临政治、经济、文化的全面衰退,已被亡国灭种的危险所笼罩。中国的未来几乎毫无希望可现。一个曾在历史上领先世界发展数千年的文明古国,突然陷入黑暗的深渊。一些明智之士开始探索中国衰落的原因,原因当然纷繁复杂,但大都把文化上的儒学归结为罪魁祸首,因此,反孔反儒成为当时文化战场上的主流。洪秀全对涉及儒学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尽情摧毁,五四前后的文化狂飙,更把讨伐孔儒作为文化时尚,儒学在中国从位至极尊一下子转换为被鄙弃对象。中国如何走?这才开始了西学东渐和仁人志士的选择性探索。人们对祸害中国的西方列强所依附的资本主义政治制度及价值观念难有亲近感,经过一番思想挣扎,五四前后先进知识分子通过俄国社会主义革命实践突然发现了思想亮光,马克思主义被介绍到中国。马克思主义进入中国,不是一般的文化移植,而是在中国社会实践处于彷徨无助的时候,被作为救亡图存的精神武器和引领社会发展的方向性旗帜,由思想先驱自觉引入的。后来的实践发展证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社会发展中发挥了巨大作用,书写了中国 20 世纪最为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独特地位,是历史和实践的选择。所以,那种认为只凭儒学文化即能完成中国人“修齐治平”社会功能,企图排挤马克思主义历史地位的议论,完全无视了那段血淋淋的历史探索和实践选择,忽视了儒学随着中国政治、经济、社会的落魄而日渐式微,在中国需要新思想的填充时,马克思主义适而至的历史背景。

传入中国之后,马克思主义在实践的砥砺中日益中国化。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已经不是游离于中国社会发展实践之外的所谓原生态的“马克思主义”,而是融入中国实践、渗透于中华民族精神、具有中国特色、中国气派、中国风格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作为融入中国近现代史、共产党党史、中华人民共和国

国史,改变了中国历史轨迹和社会面貌,融入中国人思想方式、生活方式的思想体系,其与中国百年历史实践已形成休戚与共的血肉联系,试图以儒学文化替代马克思主义的当代地位,无疑是对中国社会发展理论逻辑和历史逻辑的阻滞与瓦解。

其次,马克思主义经过中国化过程,是否已经否定了儒学存在的必要?

在中华民族的历史长河中,儒学思想形成于历史实践,并作用于社会实践的各个方面,在思想和实践的相互作用中,儒学思想对中国社会发展的价值淋漓尽致地展现出来。习近平同志认为:“从历史的角度看,包括儒家思想在内的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中的优秀成分,对中华文明形成并延续发展几千年而从未中断,对形成和维护中国团结统一的政治局面,对形成和巩固中国多民族和合一体的大家庭,对形成和丰富中华民族精神,对激励中华儿女维护民族独立、反抗外来侵略,对推动中国社会发展进步、促进中国社会利益和社会关系平衡,都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1]虽然,儒学思想价值的显现在历史某些阶段走入曲折之径,但最终会被历史所校正。比如,作为社会矛盾集中表现的农民起义,在中国表现的最为丰富,许多农民起义的肇始阶段,其欲图打破原有“君君臣臣”既有秩序的行为与精神往往具有明显的反儒意识,但就矛盾及其解决的最终结局来看,农民革命并没有摧毁封建社会制度,只是在这一社会制度的总体框架内实现了社会体制的修补和政权形式的转换,反儒思维最终消融于社会实践发展的洪流。儒学的思想秩序所造成的社会总体框架的稳固性为民族的发展、繁荣提供了条件,这是中国之所以在长期的世界历史中保持超强国家地位的重要原因。儒学思想形成之后,它本身也受到质疑、批判、否定,但儒学在历史的不同阶段,都以其思想内容的博大精深,以其所内涵的实践理性和实践趋向并入历史发展轨道。正如习近平同志所说:“儒家思想和中国历史上存在的其他学说都是与时迁移、应物变化的,都是顺应中国社会发展 and 时代前进的要求而不断发展更新的,因而具有长久的生命力。”“儒家思想和中国历史上存在的其他学说都坚持经世致用原则,注重发挥文以化人的教化功能,把对个人、社会的教化同对国家的治理结合起来,达到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目的。”^[1]一个与社会实践紧密相连、对中国历史有着如此重大影响的思想体系,如果在缺乏思想资源的当代社会发展中遭到遗弃,是不可想像的。

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马克思主义与儒学的融合问题,并没有进入党的视野,这是由当时的社会环境和文化背景,尤其是党所面临的主要任务所决定的。当然,一些人在接受马克思主义之前,大都接受过中国传统教育和儒学思想的影响,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也伴随着儒学文化的影子。李大钊等人传播历史唯物主义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时,就是和传统的“大同社会”“天下为公”观念联系起来理解的。^[2]在总结共产党初期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毛泽东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认为:“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3]⁵³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要“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就是要有“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3]⁵³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既强调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的联系,也强调与以儒学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文化的联系。在哲学大众化方面作出突出贡献的著名哲学家艾思奇曾认为,解决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要联合、学习和发扬中国民族哲学传统中优秀的一切成分”,“马克思主义及其哲学在中国有它的基础。”^[4]但,在革命时期如何实现马克思主义与以儒学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文化结合,并没有构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的重点。

建国后,儒学在新中国的文化建设中,其命运起伏不定,尤其是在一次又一次展开的对旧思想的改造和批判运动中,儒学作为旧文化的代表屡受冲击。“文革”时期,孔子和儒学在“破四旧”运动中不仅受到形象的毁灭,思想上更是遭到瓦解。更为乖戾的是一场“批林批孔”活动,把现实中的矛盾、问题毫无来由地与儒学相联系,无理性的文化狂热把孔儒更是置以被羞辱、被批判的境地。这足以说明,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我们没有认识到儒学文化的真正价值,没有从浩如烟海的传统思想资料中挖掘出儒学的真实精髓,马克思主义与儒学的融合还没有真正开始。

无论从儒学在中国历史的价值、儒家文化对当代的启示来看,还是从当代实践以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推进的需要来看,儒学文化都是我们应该深入挖掘、创新扩展的思想宝库。在中国当代社会条件下实现马克思主义与儒学的融合,对于中国社会的未来发展,对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的推进,都是有重大意义的。在马克思主义与以儒学为代表的传统文化关系上,我们缺乏的是对儒学思想为代表的传统文化足够的自信;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我们缺少的是其与儒学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融合的自觉。因此,当前重提二者融合,相对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无疑具有某种程度上的补课性质。

二、马克思主义与儒学融合的“实践”解读

(一)当代社会实践视野下二者融合的意义解读

1. 二者融合的必要性:现实实践的需要

按照唯物辩证法理解,任何事物都遵循着由简单到复杂,由低级到高级,螺旋式上升、波浪式前进的规律而运动、发展。全球化进程在拓宽人类发展道路的同时,也在积聚矛盾、叠加冲突,从而引导着历史走向复杂化。当代世界和中国发展,都存在机遇与挑战同在、发展和风险共存的局面。习近平同志认为:“当今世界,人类文明无论在物质还是精神方面都取得了巨大进步,特别是物质的极大丰富是古代世界完全不能想象的。同时,当代人类也面临着许多突出的难题,比如,贫富差距持续扩大,物欲追求奢华无度,个人主义恶性膨胀,社会诚信不断消减,伦理道德每况愈下,人与自然关系日趋紧张,等等。”^[1]当前世界局部战争烽烟不断,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侵略的横行无羁,民族矛盾与宗教矛盾的复杂交织,社会发展的全球不平衡,等。从中国角度理解,经过社会主义六十多年的发展,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的急速飞跃,中国取得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但在发展中也面临一系列问题,比如,贫富不均的问题,由于分配不公,我国的贫富差距日益扩大,严重影响了人们对共产主义这一最高理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共同理想的信仰;资源短缺问题,由于发展过程中过于注重 GDP 的增长,导致资源浪费、环境污染,导致人与自然的关系紧张,影响了发展的健康、持续;人们理想信念缺失、道德滑坡问题,导致社会出现了诸如人际关系、人与社会关系的失调;还有腐败问题的根深蒂固和治理的复杂、艰难问题;发展的创新意识不强问题;中国周边环境矛盾重重问题,等等。这些问题复杂多变。“要解决这些难题,不仅需要运用人类今天发现和发展的智慧和力量,而且需要运用人类历史上积累和储存的智慧和力量。”^[1]

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始终以社会实践问题为导向,这是由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本性及其功能特征所决定的。它拂去缠绕在历史外层纷繁复杂的迷雾,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为人类世界的未来发展指明了方向。马克思主义产生于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且在当代仍然是最具影响力、解释力的科学学说。马克思主义所蕴涵的敏锐洞察力,对当代世界发展如何摆脱困境,仍有着深刻的方法论启示。

儒学文化在中国历史中处于文化的中心地位,其积极的入世态度和对人的关注视野,是破解全球化矛盾与社会问题的思想资源,这一点已得到世界认同。富有参与现实、思维创新、紧依实践精神的儒学思想,不仅仅属于历史、属于中国,亦属于现实、属于世界。儒学已成为解决全球问题的主要思想、智慧的发源地,由此它才构成世界的热门话语和思想聚焦。

马克思主义与儒学思想,在解决社会现实问题时均有自身的独特优势,亦均需要理论的与时俱进和思维创新。从破解发展中实践难题的角度看,二者的思维方式互补和思想优势融合,都将产生不可估量的价值。因此,加强二者的对话、交流,不只是中国思想建设面临的任务,也是世界关注的一个课题。二者的融合,决不仅仅是为了寻求中国发展思想支撑的自给自足,亦是站在历史高度,以全球视野为世界发展提供中国的思想解释,这即是中国为世界发展作出的另一种贡献。

2. 建立中国话语权和重塑国际话语体系的需要

当代国际社会横行的是西方社会政治观、人权观、价值观等话语体系,西方的价值强势和文化霸权恣意对他国进行思想文化渗透,严重扰乱了国际社会秩序。就国内文化发展生态来看,西方思想价值观念的侵袭、渗透,已影响到我国国家安全和意识形态安全。一个国家的话语权,是由政治、经济、社会等发展的硬实力和思想文化发展的软实力所决定的。就文化这一软实力而言,我国有两大文化形态或说两大文化系统,一是马克思主义,这是一种外来文化但却作为主流意识形态在中国存在;二是在世界影响巨大的以儒学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文化。拥有两大文化形态,这是我国独具的文化优势。无论从国内意识形态建设还是从重塑国际社会话语体系来看,之所以需要马克思主义和儒学思想的融合,原因在于:首先,话语权的确立,必须有文化的自主创新为前提,有文化对历史和现实的贯通、统摄为根基。马克思主义尽管已经深深影响了国人的思维,但总归进入中国区区百年时间。真正贯通历史和现实的文化形态,被世界所理解、认可的中国“品牌”文化,仍然是以儒学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因此,儒学文化应该是我国话语权确立的主要思想资源之一;其次,我们有马克思主义这一科学思想体系作为指导,但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就社会制度、意识形态角度而言,大都无视这一思想体系的合理性,否认其在社会中的合法地位。面对世界意识形态偏见的存在,以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作为中国话语权的源生地,难以在世界寻觅到知音。近年,国内学者主张马克思主义的全球对话,实际上只是在有限的学术圈子内可行,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实践领域,马克思主义与西方的所谓对话的条件基本不具备;其三,中国在国际上话语权的确立,必须依赖于马克思主义与儒学文化的融合,以儒学文化的语言,以适宜于当代国际社会所能接受的形式、方式,通过阐发儒学与马克思主义融合的思想内容以影响世界,这才是中国的“有所为”。尤其是处于发展困境的当前世界对儒学的认知、认同度进一步提高,作好中国话语权在世界范围的提升,我们应该抓住机遇“趁势而为”。

(二)马克思主义与儒学思想融通的实践基础审读

马克思主义与儒学思想能否融合,关键是看其内容是否有相近性、关联性。这一问题也确实在理论界的讨论中被引起重视,但,这里有一个前提性问题却被忽略,即二者的近似是在何种意义上来理解,是字义上还是实践基础上的?如果人们的理解没有一个共同的立场和出发点,整个讨论也就因为观点的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而变成文字游戏。

立足于现实实践,纵览文化在历史逻辑中的展现及其特点进而对其进行批判、选择,这应是我们对于儒学思想的科学态度。传统文化研究者,大多从儒学中纷繁复杂、无所不包的内容中寻求方案,从浩如烟海的儒学史料中提取某些内容试图以其指导现实。问题在于,儒学本身包含着积极因素和消极因素,许多过时的、有悖于当代实践的糟粕掺杂其中,不分青红皂白拿来解释、指导实践,其结果必然导致实践的迷乱。比如,有人片面倡导“三纲五常”的现实意义,但“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要求臣、子、妻绝对服从于君、父、夫,其所反映封建社会中君臣、父子、夫妇之间的一种绝对、强制的道德关系,只会对现代社会治理的法治、民主趋向形成冲击。因此,马克思主义与儒学在何种意义、什么内容上加以融合,绝非是仅凭理性思辨所能解决的,其融合的前提和基点只能是当代实践。脱离社会实践谈马克思主义与儒学思想的融合并寻求相互关联的思想内容,无疑于缘木求鱼。

习近平同志对以儒学为代表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髓,从六个方面进行概括: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5]这一概括言简意赅,内容全面,意义深远,既是当代实践的迫切呼唤,也是以儒学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体现,更蕴含着马克思主义在当代社会发展中应有的理论出场方式。儒学思想的内容脉络,从“人”的角度而言,强调人的修身养性并重视人的道德伦理价值取向;从“社会”角度来说,重视德治、德化为特征的结构治理而追求社会和谐。“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一展示儒学雄浑抱负的思想追求,实际上内涵严密的逻辑关系是从人到社会,从修身到治国,层层递进,最后实现社会大同理想。这一倾向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是通过历史唯物主义而充分体现的。

从当代社会发展来看,尽管矛盾错综复杂,但大体还是表现为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之间的矛盾。社会发展的的问题及其解决方式,有着对接马克思主义与儒学思想的指向和要求。比如“讲仁爱”,其思想主要来源于《论语》中的“仁者爱人”,这是儒学中的核心思想,也是中国伦理学说的根本。仁爱思想是覆盖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等不同类型之间关系的道德原则。全球化实质上即是矛盾的展开过程,当今世界,民族宗教矛盾,阶级或阶层矛盾,社会发展理论、道路、制度之间的矛盾,国家安全矛盾,文化价值矛盾等,确实需要仁爱思想的规范与协调。马克思主义着眼于世界矛盾,强调解决矛盾的方式,就根源上说通过阶级斗争等手段瓦解私有制,但最终目的则是建立人们自由全面发展的社会,“仁爱”仍然是社会的目标所在。再如,“重民本”,“民本”的基本价值理念在儒学思想中主要包括“立君为民”“民惟邦本”“民贵君轻”“敬天保民”“仁民爱民”等方面,表现出人民在国家治理体系中的重要作用。“民本”思想在约束政治权力和顺应民意的前提下,揭示了不同时代深刻的执政规律,维护了社会秩序和国家稳定。^[6]马克思主义的人民主体思想与儒家民本思想至少在重视民众力量的角度上存在极其明显的相近相似。上述思想的实践意义,从中国角度审视,对于我们当前的核心价值观建设、民主建设有强烈的推动作用;从世界角度思考,它对于西方“自由、民主、人权”等充满虚假、蛊惑的价值观念,是一个有力矫正。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同样既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与儒学的价值追求,又反映了当代社会的实践要求。在实践基础上实现马克思主义与儒学思想的融合,有助于形成引领、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思想文化合力。

三、马克思主义与儒学融合应坚持的原则

在实践基础上实现马克思主义与儒学的真正融合,必须坚持如下原则。

(一)历史实践和现实实践相统一的原则

任何理论的形成及其发展,都是根植、依附于实践的。坚持理论逻辑与历史逻辑的统一,是我们认识和传承文化的根据所在。马克思主义和儒学都是产生于不同历史实践并在实践中改变历史的文化形态,其如何走向当代,有赖于后人对历史与现实逻辑的贯通把握。换言之,认识一种观点和理论,既要把握其形成时的实践语境,又要分析现实实践,在历史实践和现实实践的不同要求中理解观点和理论的可适性,进而加以取舍。按照这一原则理解马克思主义与儒学的融合,应既要考察两种文化形态各自如何实现理论逻辑与实践逻辑的统一,又要观察整合后的两种文化如何与实践形成交互作用,并在这种作用中实现自身价值。唯有在这种考察的整合中,方能在当今实践的基础上作出时代意义的阐释和选择。比如,在社会治理的价值选择和判断上,儒学思想的主要特点即是德治、德化,通过道德原则化解人、社会中的诸种矛盾,使人达到“内圣外王”的道德境界,引导人、社会走向和谐的理想状态。但是,在客观角度审视,首先影响历史逻辑的,是儒、道、释、法等诸家文化同时发挥作用的;其次,这一德治乃至德治主义式的治国方式,并没有阻止社会混乱状态的周期性出现。而中国当代社会发展逻辑要求,社会治理应该坚持法治与德治的统一。因此,结合当前国际社会发展背景及我国依法治国理念的贯彻,在实现马克思主义与儒学的融合时,应该剔除其思想的消极影响,在激发德治思想在现实社会净化功能的同时,又使其与法治社会建设相结合,才能构成其与马克思主义融合的前提条件。由此,我们对儒学的继承绝非是全盘照搬,而是选择性吸收。

(二)坚持思想传承与创新转化的统一原则

以儒学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文化,是世界上保存完整、传承有序、为当代社会所青睐的古代文明成果,马克思主义是当代最具科学性、解释力的思想形态。两大思想资源的汇聚,对于推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无疑具有重大意义。我们应该对以儒学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文化,对马克思主义抱持足够的自信。但是,自信不等于自满,更不等于停步。儒学本身经历了几千年的历史熏染,期间不可避免地沾染某

些消极因素,在历史的长河中并没有得到全面及时的清理。对儒学的自信,应建立在对其的批判分析、合理扬弃基础之上。我们决不会把儒学的所有内容全部机械地挪移到现实,必须始终对文化上的复古主义、虚无主义抱有戒心。^[7]因此,在坚持思想传承的前提下,以当代实践为基础,对传统儒学思想,或把沉积于历史烟尘之中的活的因素激活;或把阻碍时代进步的腐朽内容淘汰;或把内容、形式相矛盾的东西加以适当调适,通过去芜存菁、推陈出新,将儒学转化为引领当代实践的重要原则。

马克思主义也是如此,中国马克思主义已经走过了百年历史,已经凸显出连续性特点,从毛泽东思想到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以及习近平总书记一系列重要论述,一次次理论飞跃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形成重大发展,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即是活跃在中国这块土地上、具有中国特点和风格的当代马克思主义,经过继承、创新、转化,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已不是书本上那个“原生态”的马克思主义。因此,儒学与马克思主义的结合,主要是儒学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融合,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动实践的结合。突出融合内容的创新,突出融合方式的创新,是我们马克思主义与儒学融合的题中应有之义。

(三)坚持二者结合中的主辅原则

习近平同志指出:“中国共产党人是马克思主义者,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学说,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但中国共产党人不是历史虚无主义者,也不是文化虚无主义者。我们从来认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必须同中国具体实际紧密结合起来,应该科学对待民族传统文化,科学对待世界各国文化,用人类创造的一切优秀思想文化成果武装自己。”^[1]这就鲜明地指出了马克思主义与儒学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的主辅关系。马克思主义是我们治党、治国的指导思想,在当代中国意识形态占有主导地位,这是不能动摇的基本原则,吸收、融合儒学思想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展开的,处于辅助位置。其实道理很简单。首先,鸦片战争以后,在中国处于生死存亡的关键时期,中国人经过实践探索和思想文化的大论战、大选择,最终选择了马克思主义,这是不由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历史性选择,是人类历史发展规律在中国社会的特殊体现;其次,马克思主义对中国共产党实践的指导,对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的引领,所取得的成就举世公认,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社会发展中的巨大能量释放决定了其历史地位的不可撼动;第三,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百年发展,已经得到国人的认同,马克思主义已成为中国民族精神的重要部分,成为与中国人休戚与共、密不可分的文化符号和思想印记。

承认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这一论断决非是随意而发,而是在考量中国的近、现代史后而形成的结论,是从中国当代所进行的社会主义建设以及小康社会、现代化建设实践中而得出的结论,它蕴含着深厚的历史感、现实感。

参考文献:

- [1]习近平.在纪念孔子诞辰 2565 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暨国际儒学联合会第五届会员大会开幕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4-09-25(1).
- [2]石仲泉.天之降大任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N].天津日报,2015-01-05(9).
- [3]毛泽东选集:第 2 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534.
- [4]哲学选辑[M].延安:延安出版社,1939:437-438.
- [5]习近平.在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十三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4-02-26(1).
- [6]郭齐勇,等.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N].光明日报,2014-07-22(16).
- [7]徐向红.弘扬中华文化增强责任担当[N].光明日报,2014-09-30(16).